

中国主流电影红色叙事考察

闫德亮 李娟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在中国电影的发展格局中,以红色经典为主题的中国主流电影,已经成为在国内电影市场占据主要地位的电影形态,承担着建构中国电影精神图景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的道路成为不断生产全球视域下中国故事的过程,电影作为文艺话语同样不可缺席,这就要求故事议题要彰显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以及话语的相关资源。选好电影的叙事视角无疑是讲好中国故事、实践跨文化沟通愿景的前提,也势必成为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核心议题。新时期的中国主流电影不仅需要将受众带回到历史场景,见证中国的历史变迁,同时还继续承载着民族记忆,要在电影文本中讲述那些能够激发受众更深层情感共鸣的故事。要深度思考如何通过红色记忆、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等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基因转化为显性文艺文本,参与建构较为完整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以期实现跨文化间的良好互动、交流与沟通。

关键词:中国主流电影;红色叙事;中国话语

中图分类号: J9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20)05-0072-06

如今的世界电影舞台,各国都在发掘最具本民族特色的精神文化资源,这已经成为电影创作生产的普遍现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塑造中国形象,成为当前中国主流电影的重要使命与现实要求。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由红色记忆、红色故事、红色精神凝结而成的红色基因,成为红色文化中的遗传密码,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在全球化文化逻辑框架的影响之下,中国电影需要始终怀着对人类历史及生命本身的敬畏,在全球性的道德框架与共通语言中,讲述中国的发展方向与表现民族生命力的故事内容。尤其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为实现民族精神和民众情感结构的高度契合,满足新时代观众的审美需求,作为包括电影在内的中国主流文艺作品,需要积极探索红色叙事深度参与其生产与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红色记忆参与电影精神图景的建构

“历史记忆这个词,不仅包括它记忆的对象是历史事件,同时记忆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不断传承、延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构成历史。”^[1]作为历史记忆的一种形态,红色记忆是组成大众共同记忆库的重要内容,对于建构国家的同一性、形塑国民的归属

感、激发全社会的精神力量均具有重要意义。红色文化蕴涵的红色记忆一直都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中国主流文艺作品的重要叙事资源。21世纪以来,电影《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伟业》《可爱的中国》《辛亥革命》《百团大战》《血战湘江》《古田军号》《红星照耀中国》等,或以宏阔的历史笔触描摹革命事件,或以细腻的艺术刻画再现领袖人物风采,更多的是通过宏大叙事与个体情感记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影像表述,彰显出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与家国情怀,折射出民族复兴与文化发展的自信和成熟。其中,《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伟业》多以编年体叙事方式,对国家正史进行宏大的影像化表述。这些电影通过对红色记忆的讲述以及对重要事件的阐释,唤起观众群体心中的集体记忆,进而增强民族情感和归属意识。中国电影对于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控制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影响,需要以民族记忆表达时代脉动,以国家叙事饱含的理想主义描摹时代的变迁与精神图谱,以思想的穿透力将情感融入历史的长河。同时,相较于宏大叙事,中国主流电影同样需要以碎片化的话语形式编织成“历史的细语”,在看似普通平凡中展示历史伟人的喜怒哀乐。电影《红星照耀中国》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埃

收稿日期:2020-06-30

作者简介:闫德亮(1964-),男,河南罗山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社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李娟(1975-),女,山东济南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社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传承红色文化基因研究”(项目编号:20A05)。

德加·斯诺来华走访红色革命区域为叙事主线,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士和苏区百姓的革命精神与英雄风采,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形。电影以一位西方记者的视角对海内外观众讲述“延安记忆”,为世界观众了解中国的革命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电影历史文本,斯诺的“叙事”就成为连通中西、古今、受众之间的桥梁。而气势磅礴、震撼人心的史诗巨片《古田军号》则以小切口展现重大历史事件,选取“军号”作为线索将红色记忆进行跨越90年时空的艺术表达,电影以充满诗意化的叙事符号,鲜活地再现了革命领袖开辟革命成功之路的伟大历程。中国主流电影对于红色记忆的诠释与传播,深度参与了中国电影文化命脉的延续与精神图景的勾画,为当代人提供了新的审美体验、文化阐释与精神建构空间,与当代大众的精神需求和心灵诉求互为表里。红色记忆已经日渐成为“红色经典”文本的主要内容,往往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针对受众群体进行传播,建构了革命中国、英雄中国、奋进中国的壮美图景。在中国电影的发展格局中,以红色经典为主题的中国主流电影,已经成为在国内电影市场占据主要地位的电影形态,承担着建构中国电影精神图景的重要历史使命。这些电影在叙事方面尽量将抽象的历史符号进行转化,注重挖掘、展现以红色记忆讲述中国故事的宝贵“符号资源”,从而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进行缝合,以实现艺术性与商业性、主流价值与叙事立场的良性互动。例如,电影《张思德》《云水谣》《集结号》《秋之白华》《周恩来回延安》等,一改过去将革命人物模式化、脸谱化、概念化的描绘,摒弃了仅借助历史事件简单传递价值取向的叙事习惯,而是将历史人物群体赋予更丰富的普通人的情感,更加注重在历史洪流中展示个体的生死悲欢与跌宕命运。中国主流电影需要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渗透融合,展示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和审美追求,将国家发展的跌宕起伏与波澜壮阔、历史伟人的雄才伟略与普通情感进行融合,达到精神价值和世俗情怀的统一,从而拓宽中国主流电影作品叙事空间的思想力、表现力与吸引力。红色记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征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革命年代仁人志士的战斗史实和斗争精神的凝结,具有重要的精神动力价值。近年来,中国主流电影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汲取更加多元化、丰富化。《秋之白华》如同一首唯美的散文诗,在讲述杨之华与瞿秋白从相知相爱到痛苦分离,以致最终瞿秋白从容就义,坦诚、纯粹与安静、顺畅的叙事节奏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韵味。电影在讲述者、回忆者、倾听者、追溯者等多元化的叙事视角中切换融合,较好地 在人物传记的再现中完成纪实、纪念、感召与传承。《张思德》则以黑白影像特有的历史

质感与庄重感,将革命人物形塑为血肉丰满又充满人格魅力的生命个体,以大家熟悉的情节内容唤醒特定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正是在此基础上,观众对于民族与国家的热爱之情才会逐渐自觉孕育并滋生出来。当前的历史语境中,中国主流电影通过更加符合当下民众的思维模式对于红色记忆进行表达,实现与观众的沟通与交流,引领观众进行独立思考并建构独有的精神世界。中国主流电影较好地传递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存在和审美追求,深度参与了民众历史记忆与精神世界的建构。作为当下文艺创作的一种重要资源,中国的红色经典仍需要进行深度的改编,为社会转型中价值系统的变迁与民族心灵史的建构奠定坚实基础。

二、红色故事参与电影叙事模式的转型

中国主流电影成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与世界文化互动的重要方式之一,需要更多地设置全球性议题,在彰显自身文化符码、文化基因、文化精神的同时,积极寻找与世界共有的文化情感与文化价值,进而提供特有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的思考。中国独有的红色故事成为提升中国人精神维度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成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载体。中国主流电影在讲述红色故事的期待视野中,满足了受众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记忆与向往,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塑民族独特的意志品格。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主流电影正在不断调整已有的叙事习惯,寻找借鉴商业元素、艺术审美、主流形态相融合的叙事可能性,力图在多重向度中更加突出较为饱满的个体形象,完成主流电影的叙事转型。21世纪以来,以红色故事为叙事主题的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东京审判》《智取威虎山》《芳华》《无问西东》都在努力寻求国家叙事和民众话语相结合的表达路径。如卫·赫尔曼对于叙事文本的生成机制的认识“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单由其形式决定,而是由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2](P8)这些中国主流电影叙事缝合了当下的社会文化心理,在“故事”及其传递的情感在历史想象与现实空间中搭建起了沟通互文的精神桥梁。红色故事的当代阐释,题材艺术创作的优良借鉴,为提升中国观众审美素养、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的道路成为不断生产全球视域下中国故事的过程,电影作为文艺话语同样不可或缺,这就要求故事议题要彰显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以及相关的话语资源。选好电影的叙事视角无疑是讲好中国故事、实践跨文化沟通愿景的前提,也势必成为国家对外文化传播的核心议题。《我的法兰西岁月》以邓小平青年时期的成长为视角,如诗般展现了革命

者追求信仰的坎坷、青春岁月的激情和理想信念的崇高。而《智取威虎山》在改编原著的基础上,较好地将军革命精神、主流价值观念、扣人心弦的故事、紧张刺激的视觉效果进行了融合,以期实现民族文化的认同与红色精神的传承。《芳华》《无问西东》则选择了更加贴近大众的故事类型与讲述视角,对于在现实价值序列中的个体发出理想主义光辉的召唤,基本都获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赢。红色故事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承载的精神内涵成为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红色故事是时代使命。中国主流电影在讲述红色故事的时候,通过对视角、话语、叙事表达的调整,为受众还原宏观而真实的社会发展风貌,并引领民众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希望与未来。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可谓是一部民族精神的生长史,讲故事是民族文化发展的特色与强项。中国近百年的党史、几十年的革命史更是留下了扣人心弦、感人至深的故事,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讲好故事,其实是以一种隐喻说理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信仰的力量,可以更好地避免说教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文化的民族,英雄本质上也是一种文化概念,通常需要借助艺术作品,传递人物身上鲜明的勇敢形象、过人胆识、责任担当,以及关键时刻凸显的人性中最为光辉的神圣内容。对于英雄故事的讲述在谍战题材的主流电影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秋喜》《风声》《听风者》《东风雨》《王牌》《一号目标》《触不可及》等谍战电影,大多以扣人心弦、悬念丛生、跌宕起伏的故事满足了观众对英雄人物的无尽想象,成为具有较强吸引力的电影类型。《风声》是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中国大陆首部谍战主题电影,成为中国主流电影借助中国故事进行叙事转型的大胆探索。对于红色故事的话语实践带动了民众观影兴趣与消费心理的转变。电影运用了过多酷刑暴力血腥场面,某种程度上极度的压抑感迎合了受众的幻想,甚至成了一种施虐狂式的幻想,这让该部作品曾经备受争议。中国主流电影中展示的酷刑,是用来衬托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崇高信仰、大无畏精神,虽然《风声》中对于酷刑的奇观化与叙事主题存在脱裂,成为女性身体的“被看”意味的影像奇观,但作为中国主流电影的新形态,《风声》也是借助商业电影类型以及以历史的残忍再现,来唤醒当代中国人爱国信仰的积极探索之作。

“当电影由一种记录性‘写实’呈现,演进为以某种‘特定叙述方式’展示故事,从而引起人们的推想、悬念和惊奇时,电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艺术。”[3](P26)电

影《听风者》同样改编自麦家的原著小说《暗算》,与以往谍战电影相比,这部电影更具有浓郁的文艺气息,故事的建构最大限度借助了声音元素,悬念的设置虽然不算太多,更多的是内心戏的演绎,展现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内涵与谍战局势的复杂交织。谍战电影中的悬念成为构成故事情节最具魅力的元素,红色故事成为谍战电影文本的叙事动力,改变了固有的叙事样本与叙事模式。谍战主题电影的出现避免了简单的道德说教,更加注重调动接受者的情感体验与认知,使其逐渐接受与认同红色故事中的精神意蕴与价值逻辑,从而潜移默化地建构国家形象。谍战电影讲述红色故事需要积极探索多重格局中的叙事模式,加速电影商业性与审美化叙事的转型。

三、红色精神参与电影话语实践的传播

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中迫切需要中国文艺话语的积极参与,电影在话语层面的表现力、创造力、传播力与感召力具有自身较强的独特优势。中国电影迫切需要融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作品,使其能够打动观众的心灵并突破文化藩篱,从而走向世界更广阔的展示平台。要通过中国主流电影传递红色精神,让红色精神深度参与电影话语实践层面的传播,增强民众在观影中逐渐产生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其中,中国主流电影通常会选择借助灾难主题,展示对于国家与人民的热爱与责任。灾难主题电影《紧急迫降》《唐山大地震》《惊涛骇浪》《惊心动魄》《惊天动地》《生死大营救》《超强台风》《生死时刻》《流浪地球》等,彰显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让观众感受到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让中国人情感相连、命运相系,电影蕴含的红色精神与时代精神成为中国人的动力之源。这些电影作品以凸显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语义环境,探索主流价值与个体生命感悟进行缝合的路径。灾难主题电影也成为文化意识由自发形态向自觉形态转变的见证,需要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思考人类面临的困境,并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将中国特有的红色精神进行彰显与传播。

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流电影,以感人肺腑的灾难故事再现了中国改革发展走过的艰难历程,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进行了较好的诠释,彰显了中国人坚守信仰、不屈不挠、胸怀大局、敢于担当的红色精神,引领、感召着当代人在现实生活中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电影《惊涛骇浪》《惊心动魄》《惊天动地》可谓借助灾难主题电影谱写了当代的中国英雄史诗,塑造了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当代中国人的群像,生动地诠释了临危不惧、拼搏进取、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中国精神。《惊涛骇浪》以1998年抗洪抢险为背景,全景式地展现了军民一心夺取抗洪斗争胜利的故事。《惊心

动魄》以2003年抗击非典为背景,描摹了在疫情中舍生忘死的医务工作者。《惊天动地》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救援为背景,讲述了大灾面前生死救援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作为中国主流电影的灾难主题电影,成为传递中国精神的重要文艺载体。中国主流电影对于红色精神的弘扬,更加紧贴民众的日常生活,浸润心灵、精华灵魂、提振士气,在潜移默化中感触革命精神的伟大与崇高。

中国主流电影成为中国精神表达的重要载体,需要通过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唤醒民众沉睡的集体记忆,进而增强对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与归属。具有特定意义的历史事件以其特有的时间和空间特征,成为民族历史的“神话”叙事,需要在叙事中更加着力于“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中,中国主流电影对于英雄人物的描摹与红色精神的传播,更多的是借助于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进行挖掘,将普通人活生生的故事植入电影故事之中,进而展现英雄群体形象,并彰显时代精神。2019年国庆档上映了电影《中国机长》,根据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航班组成功处置突发状况真实事件改编而成,惊心动魄的故事设置激发了观众的心灵感应与情感共鸣。故事将焦点放在展示特殊环境下普通人身上的神性光辉,以普通人物的英雄化张扬人类的美好品质。电影传达了新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结合国庆期间的社会与情感环境,呈现出巨大的感染力与震撼力,成为建构集体记忆的重要故事资源。作为电影《中国机长》的主角,机长刘建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他是一个具有较强责任心与较高业务素质的机长,敬业、勤奋、自律、守则、勇敢,其传递的时代精神是当代人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电影取材于真实飞行事件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与吸引力,而灾难场景中的极端紧张气氛的营造与节奏的把控,让受众拥有一种临场感,增强了受众的感受效果。中国主流电影需要在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成长与成熟中发挥积极作用,寻找推动弘扬中国精神的叙事方式,以真实化与生活化的叙事策略形成良性互动与互利共赢。

中国主流电影致力于积极拓展叙事文本层面多元与包容的文化空间,为建构全球化的文化认同和想象提供范本支持。同时,中国主流电影习惯于将普通民众个体的经历放置在历史空间中,使民众成为历史的在场者,借助真实的情感经验与深入思考并实现价值观念的重新建构,从而以主流价值和审美观引导民众寻找生命的价值感与力量感。2019年号称中国首部“硬核科幻片”的《流浪地球》,成为继《战狼2》之后第二部票房超过40亿的国产主流叙事电影,被称为“现象级电影作品”。中国主流电影在摒弃“逃离”的思维

模式后,独创了崭新的“流浪”叙事范式,在传递家国情怀的同时体现了中国对宇宙与人类发展的独特想象与空间驾驭能力,更加凸显了中国人团结奋斗、共克时艰、勇往直前的精神。新时期的中国主流电影不仅需要受众带回到历史场景,见证中国的历史变迁,同时还继续承载着受众的民族记忆,要在电影文本中讲述那些能够激发受众更深层次情感共鸣的故事。中国主流电影需要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创造时代精品,以更加广阔的主题格局与空间格局,以特有的更加高远的价值观和想象力,进一步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命题,积极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及中国故事。

四、红色文化参与电影生产格局的形成

红色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凝结形成的观念意识形态,讲好红色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可以为行进中的中国补充精神能量,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撑。作为一种重要的文艺实践,中国主流电影以其特有的优势呈现出独有的人文精神,共同构成可视可感的国家形象并积极建构良好的电影文化生态。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红色文化的遗传密码,是取得伟大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流电影,以传递红色基因再现了中国革命走过的艰苦历程,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进行了较好的诠释。而具有坚定价值立场、鲜明时代特征与消费市场认同的主流电影,也日趋成为当代中国电影家族中的主要成员与重要角色。《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厉害了,我的国》《智取威虎山》《空天猎》《我爱我的祖国》《攀登者》《烈火英雄》等一批蕴含红色文化的主流电影回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根基所在,积极参与了中国电影生产格局的形成。

“在全球化的国际流词语境中,积极建构与传播中国电影蕴含的人生内涵、理想价值、人文情怀,尤其是针对民族集体记忆、民族文化主体形象与民族精神,成为中国电影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4]《湄公河行动》《战狼2》《红海行动》等电影在口碑与票房层面均获双丰收,将国家民族命运与个人情感、集体群像与英雄壮举均进行了互文表述。基于主流价值理念传播的同时,积极参与了市场的日渐成熟与中国电影的成长,在各个层面的博弈与互动中稳步构建中国电影独有的话语风格。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同样成为中国话语不断参加全球化生产的过程,而电影作为文艺话语必定无法缺席,这就需要认真理清当代中国最宝贵的故事资源有哪些,如何调整叙事视角,转换叙事话语,传播什么样的精神特质。无论是缉毒战斗,还是海外撤侨行动等故事,蕴含红色文化特质的主流电影在影

像话语生产方面都彰显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地位,展示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对全人类的关怀与尊重以及对于世界和平发展秩序的维护,折射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要深度思考如何通过红色记忆、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等红色文化资源,将红色基因转化为显性文艺文本,参与建构较为完整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以期实现跨文化间的良好互动、交流与沟通。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文化资本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市场,无疑需要创造新的影像叙事形态助推现代社会心理步入成熟。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拥有自我形塑的责任与传播形象的建构性力量。2019年国庆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仅用一周时间就实现票房破20亿元的记录。与以往中国的主流电影不同,《我和我的祖国》由《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护航》7部短片组成。电影以普通人的“小故事”视角,讲述新中国70年发展中的“大事件”,包括1949年的开国大典、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1981年中国女排奥运会第一次夺冠、1997年香港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2016年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关键历史节点,将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爱国之情与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融合表达。电影选择了更加个人化的视角,“国家”不再是一个空泛、抽象而宏大的概念,而是以影像话语构建出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互融场域,并在其中对老百姓与民族、国家进行互动描摹与叙事展现。

红色基因已经成为建构国家记忆的结构要素,需要借助中国主流电影完成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并建立起相应的叙事价值逻辑,形塑具体性与概念性并存的国家形象。中国电影在参与世界文化交流与塑造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化、本土化的内容生产与类型化、商业化的传播方面,正在积极探索、形成独具中国话语特色的文化面貌。红色文化同样成为形成中国电影生产格局的积极参与者,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电影《智取威虎山》改编自小说《林海雪原》,这是一部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具有较强政治意味的红色文学经典。作为中国主流电影的新形态,《智取威虎山》改变了刻板僵硬的叙事传统,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进行了再度传递。电影借助一位现代社会青年作为故事的叙述者,讲述了一个除暴安民的侠义剿匪传奇故事,较好地将红色主题与扣人心弦的曲折故事,以及刺激紧张的视觉效果进行了融合,使当代主流价值观念与个体生命经验开始联系,进而将权力型、政策性传播与消费性传播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受到电影市场的普遍关注。由此,中国主流电影成为实

现红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通过故事化、视觉化的讲述方式承载着民族化的话语方式,成为影响国产电影在商业电影、主流电影、艺术电影生产格局中的重要成员。

五、红色叙事助推中国主流电影的发展

文化基因是指那些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产生深远意义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红色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形态,同时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文化系统,其包含的理想信念之光是穿越时空的核心力量,承载了许多至今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元素。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流电影在继承电影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尊重电影本身特点与规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叙事主题,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精神内涵,主流化与代际化的呈现标准,商业化与类型化的生产模式,形成了具有中国话语实践创新特色的主流电影风貌与格局。

红色叙事要参与中国主流电影的国家叙事。叙事学是关于叙事理论的系统研究,而国家叙事是从国家层面对叙事文本开展对外传播研究的理论科学,也是表现国家认知、国民情绪、国民价值的具体叙事行为[5]。国家叙事是代表国家利益的话语系统,具有庄重感、主流感与权威感,是用来表达民族精神、国家利益的宏大话语概念。中国主流电影在传递中国形象、中国声音、中国价值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借助中国主流电影讲述让世界听得懂、听得清、有共鸣的好故事,是诠释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能够彰显中国理论的实践价值与独特魅力。红色叙事形成的观念意识形态,其话语表达、叙事风格与现时代大众的心理需求,目前还存在某种程度的疏离。要更加重视红色叙事融入中国主流电影国家叙事的力度,推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走向世界,在国际话语和交流中把握时机,积极参与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将红色中国之“道”贯穿于故事之中,特别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愿景之下,将红色中国故事通过电影进行国际传播并得到认同与共识。只有积极探索研究相关理论与实践,深度设置红色资源在国际传播中的模式,才能探索出适合中国形象构建与传递中国声音的路径,在国际社会中赢得接受、认可与合作,为共同建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艺实践的力量。

红色叙事要参与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传播。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的载体,在借助影像讲述故事的同时肩负着传递国家主流价值的重要责任。红色资源是中国重要的优秀文化资源之一,支撑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也是文化自信的精神动能。“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

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6](P7)红色文化蕴含了独有人文气质、民族精神、文化内涵,成为建构国家整体形象、传播主流价值的重要资源,对于建构当代中国人精神图谱、关怀当代人的深度焦虑、思考和追问生命存在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主流电影在西方强势文化压制和本土文化夹缝之中艰难前行,要积极借助红色文化资源创作全球共享价值的产品,以更具智慧的红色叙事,实现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消费群体的同频共振,以期在全球化的时空中筑牢民族文化的根基。

红色叙事要参与中国主流电影的空间拓展。电影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一种形态,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公共空间。电影的话语空间往往是叙述者将故事中原有的空间意象借助电影语言进行再现,而对于电影空间的选择性建构不仅是叙事内容的空间呈现,也成为电影叙事主题隐喻意义的空间表达。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了伟大的红色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公共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以红色文化为底色的时代精神的传递,需要在实现民众文化消费中融入心底,成为大众精神与意识层面的清流。中国主流电影需要深入研判、把握当代受众的心理需求,选择多层次的红色叙事内容与历史人物形象设置,以及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内在联系、基本立场和情感态度,以故事的涵摄性与价值的辐射性,拓展电影的话语空间。中国电影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多元话语空间和场域,更是一种相对较为开放和灵活的电影发展形态。中国主流电影要认真寻找国家话语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缝合点,通过对电影叙事价值取向的优化,最终形成主流价值、艺术性与商业性等多元调和的话语形态,不断拓展叙事的理论空间与话语空间,形成体现大国气质、大国类型特征的中国主流电影话语体系。

红色叙事要参与中国主流电影的资源转化。蕴藏

在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抱负,成为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红色资源作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属性的资源,同样应该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文明成果。中国主流电影需要积极吸收、转化红色文化资源,调整故事主题的选择与叙事策略,提升话语的生产与故事传播的能力,寻找与商业电影进行融合的途径与形态,实现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升级的目标。同时,红色叙事要突出历史语境中民族精神景观和民众文化心理空间,在尊重历史、艺术、市场、观众的基础上,注重通过普通个体形象塑造构建国家形象,在促进情感与价值共鸣产生的基础上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

红色叙事要助推中国主流电影的良性发展。国家叙事对于中国主流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能力和话语控制力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红色故事的架构与讲述对于国产电影的叙事主体内容、语境场域和话语规则的基础,具有多重积极影响。红色叙事参与了中国电影生产发展格局的形成,参与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电影美学风格和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的形成,参与了正在日渐成熟的电影消费市场的形成,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快速发展与成长。目前,中国电影已经进入了需要进行深度资源整合的IP时代,作为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进程的主力军,中国主流电影需要进行IP跨媒介再生产增值,使其推动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电影的全球影响力与竞争力。随着社会语境与受众心理的变迁,红色叙事需要表达民众的丰富情感,在艺术性与商业性的博弈中构建新的中国电影话语体系,突破已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叙事结构,在分析其与具体文化互动关系基础上,展现特定场域中的国家文化历史符码。同时,中国主流电影可以借助优质的红色文化IP资源,为接受者提供文艺精品,使得中国电影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与良性发展的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 [1]赵世瑜.传说·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3(3).
- [2]赫尔曼.新叙事学[M].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3]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践[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
- [4]李娟.影像媒介叙事中的民族集体记忆建构[J].中州学刊,2013(9).
- [5]赵新利,张蓉.国家叙事与中国形象的故事化传播策略[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 [6]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 乔学杰)